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十七辑

要 目

- 重读《囚徒歌》的回想……………金 丁
- 在“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的曲折斗争……………白 仑
- “七·七”事变亲历记……………洪大中
- 牛街礼拜寺简介……………石昆宾
- 雍和宫见闻……………刘宝英



北京出版社

111
N8
198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P

1986, 1, 5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十 七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6,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0

书号: 11071·186 定价: 0.77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七辑 目 录

- 重读《囚徒歌》的回想 金 丁 (1)
- 在日寇监狱中 吴之冈 (13)
- 在“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的曲折斗争 白 仑 (30)
- “七·七”事变亲历记 洪大中 (79)
- 在炮火中登上宛平城墙 陆 诒 (98)
- 父亲沈钧儒与我的绘画 沈叔羊 (102)
- 我的朋友邓散木 王逸如 (109)
- 牛街礼拜寺简介 石昆宾 (113)
- 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考 刘盛林 (118)
- 西花市清真寺历史概况 唐振宇 (133)
- 朝阳区长营清真寺 张玉昆 (136)
- 成达师范简介 艾宜栽 (138)
- 雍和宫见闻 刘宝英 (147)
- 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史料片断 张孝谋 胡景权 (205)

解放前的花市布店业	赵孟春 (222)
北平市企业公司的组成及概况	冯杰宸 (235)
国民党崩溃前的一次经济大掠夺	
——记北平市执行蒋介石“财政经济处分令”	
的经过	白 丁 (241)

重读《囚徒歌》的回想

金 丁

“谁能估量我们在这段长期监狱生活中所具有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耐心呢？谁能估量这样悲惨的命运呢？我们之所以能对付这样的命运，就是因为我们能不让命运把我们驱赶到容忍的极限，不使我们堕入各种各样的失望中，而在胡作非为的种种暴行下，我们依然是顽强坚定和不可制服的。”

——恩斯特·台尔曼



没想到徐迈进同志收到我信的当天晚上，就把他五十三年前（一九二九年）谱写的《囚徒歌》抄给我了。词曲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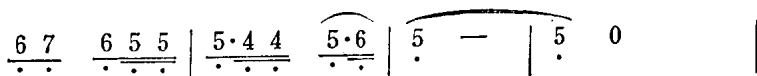
囚 徒 歌

1=G 2/4

兼三词曲（徐迈进，字兼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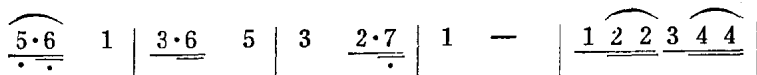
庄严·稍慢

: <u>5</u> 1·	<u>7 2 2</u> <u>1·6</u>	5 —	<u>3</u> 3·	<u>5·6</u> <u>5 4</u>
囚 徒，	时 代 的 囚 徒。	我 们	并 不 犯	
3 —	<u>6</u> 6·	<u>5·4</u> <u>3 1 1</u>	<u>2·3</u> 2	<u>2</u> 1·
罪，	我 们	都 从 火 线 上	俘 来，	从 那



阶级 斗争的 火线上 俘 来，

(进行曲速度，坚决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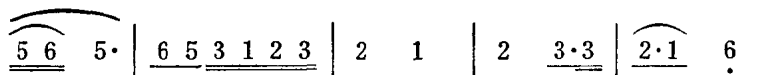


囚 徒，不是 囚 徒 是俘 虏。

凭他 怎么样

死的 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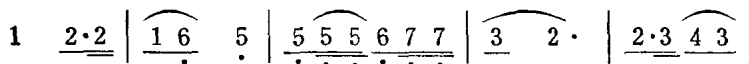
失败是成功之



虐 待，热血依旧是在 沸 腾， 铁 窗和 镣 铐，

牺 牲 了，活的依旧是在 战 斗， 黄 饭和 臭 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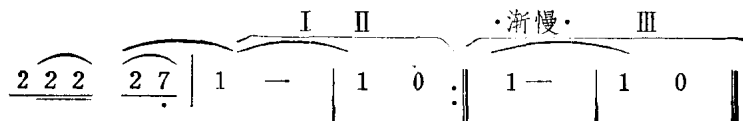
母， 胜利终归我们 所 有， 努 力呀 锻 炼，



坚 壁和 重 门，锁得住自由的 身， 锁不住

蚊 蝇和 蚤 虱，瘦得了我们的 肉， 瘦不了

勇 敢呀 奋 斗！总有一天的 红 旗， 随着太阳



革命的 精 神！

球！

我们的 骨！

照遍 全

这支歌我已记不清唱过多少遍了。为什么到了迟暮之年，居然又热衷于青年时喜唱的歌曲？是因为自己生活中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今天仍会在精神上给人以更多的支持吗？

我看着写字桌玻璃板下的两张照片，是今年我那出生在东北的小孙子在苏州照的。他路过北京时，听祖母说，我曾在苏州住过四年之久，非常羡慕。因为他只在苏州逛了两天，就觉得很高兴了。他还不到能理解我在苏州坐牢那种遭遇的年岁。其实，现在有些年龄稍大，譬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吧，是不是对牢狱生活也只限于道听途说而已呢？

除了住过三所监狱，苏州的一切风景名胜，几乎都与我无缘。出狱的时候，我的家乡已是敌骑纵横，所谓“荆榛障道家犹运，烽火连云国半湮”（见《少石遗诗》^①），什么岩花野草，都已无心看了。待到解放以后，我虽几次经过苏州，但也只是“路过”，并未在那里停留过，这或者是件憾事。但这三所监狱，现在想来，确不失为在青年时的“我的大学”。

我被关在苏州的第一所监狱，是座落在司前街的第三分监。这里关有政治犯和普通犯，多数是不曾判决或虽判决但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所谓“官司未定”，是属于拘留的性质，所以三分监也叫看守所。

第三分监只有一个弄堂（记得叫二弄）关的完全是政治犯，弄里有大小不一的八个号子（牢房）。我最初被关在最大的一个号子里，大约是十四五平方米吧，沿着四壁是靠墙固定的二尺多宽的床板，床板边缘离地一尺多高，也钉着落地的木板。因此，床既不

^① 少石，即李少石，是我的同狱难友。

能移动,也不能往床底下放东西。大家就挤在这木板床上睡觉。地板则潮得发霉。原来这间牢房关了八个人,加上大家的脸盆、碗筷、被子、棉衣和零用杂物,把周围的所谓“床铺”几乎占了三分之一。门当然是锁着的,马桶就堵在门口。我从上海解到苏州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初,正是三伏天,一关进号子里,立刻就有一阵闷热奇臭扑来,压到胸上,令人感到呼吸困难。床上已经睡满了人。我勉强忍着晕眩,在地板上找了个安身之处,用上衣把鞋子裹好,枕到头下,真想大睡一场了。但这时有位难友送给我一碗凉开水,我感激地望着对方,我多么想喝到一口水啊!于是大家交谈起来。这间号子里竟有六位都是同案,是从苏北抓来的农民,他们关在三分监已经一年多了。其中一个年纪最轻的,染患疟疾多日,人瘦得只剩皮包骨。他躺在那里起不来,混身发抖。为什么向医务室讨几粒奎宁药丸都不给呢?

侥幸的是这间牢房居然有两扇窗,尽管下午夕晒,热得象在蒸笼里一样,但有时能从窗里望望远处的-角狭窄的蓝天,多少可以解除寂寞。我想念亲人和同志,他们还不知道我现在已关到苏州了吧?

一天“放风”两次,但大家也只能在弄堂里走走,每次约二十到三十分钟。我没有想到在第一次“放风”时就遇到艾芜。他就关在隔壁,已经来了两个多月了。他是因为到工厂里去找一个熟人,被守候在那里的暗探逮捕的。我们从如何寄信谈起,觉得和外间失掉联系是特别苦恼的。这位以《人生哲学的一课》闻名的作者,他正默默地蹲在牢房里写他的小说,说是写好了的一个短篇刚刚寄出不久。值夜班的一个看守,是可以代寄“私”信的,只需花两角小洋,次日就可拿到挂号的收条。

受艾芜的启示，我感到在上海公安局身受、目睹和耳闻的特务们的法西斯暴行，有尽快揭露的必要。于是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写完题为《两种人》的短篇。我恍然觉得关在监狱里，依然可以生活得有意义。

和第三监狱比起来，分监对政治犯的待遇是有区别的。我被押解到第三监狱时，一进门立刻就给钉上脚镣。在分监却不曾遇到这样的刑罚；也不象第三监狱，每月只能写家信一封，这里每天都能写信，由管理科检讫寄发。吸烟当然是禁止的，但在我们买邮票和信封信纸的地方，也能买到纸烟。有钱的刑事犯，早晨可以买到油条、大饼。但对一般政治犯说来，大家吃的黄米饭确实难以下咽，沙子、稗子极多，而且不足定量的三分之二。

因为每人的案情不同，有的毫无人证物证，外面如能有人设法营救，免于起诉或判决无罪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在政治犯里，对监狱当局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我到三分监的第二天早晨，就听到对门号子里有人领头唱起了《国际歌》，可是旁的号子里并没有什么动静。不过有时居然是几个号子同时唱起来了，看守无法制止。什么原因会使大家一齐唱起来呢？

我还没有在监狱里斗争的经验，不过直觉地感到，唱歌总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快慰。监狱的生活，是单调、沉闷和孤寂的，整天就是或坐或卧，牢房里没有活动的余地。如何突破情绪上因环境的狭窄而造成的无奈呢？我以为唱歌是个好办法。一唱歌，就仿佛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刻同外面广阔的世界沟通起来。我爱唱外面不能随意唱的歌曲。我学会了唱《国际歌》。我特别喜欢《少年先锋队》歌。是啊，“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那种明快而激越的调子，不是唱起来就象什么困难、危险都无所谓了吗？

然而，还有什么歌，它最能反映我们在牢狱中的遭遇和感受呢？

连绵不断的阴雨，又是多日不曾收到亲人的来信，使我感到苦恼。我反复读着不知多少人传阅过的柴门霍甫的《自传》，他真是深得我心，“人生最快乐的日子，我过得最悲哀”，我还很年轻，完全说不上为革命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就被捕了。我渴望自由。我想我应当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只有失掉自由的人才更知道自由的可贵。不是有不少比我更年轻的同志，他们却早已被反动派杀害了吗？

带着这样悲愤的心情，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对门的一位难友唱起了《囚徒歌》。他唱得那么缓慢而严肃，歌声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确实是么：“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俘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俘来。”“不是囚徒是俘虏。”

歌词不知何人所作，由谁谱曲。对我唱起《囚徒歌》的同志，只会唱第一段，还有二两段他没学全，就被解到苏州来了。不过单是这第一段，就确实唱出政治犯的心声，而且唱起来令人感到鼓舞：“凭他怎么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锁不住革命的精神！”

转眼秋凉。我的那篇署名金丁的小说《两种人》，居然在名为《现代》的杂志上发表了。我很高兴。但是不久，我受到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庭的传讯。上海公安局派来一个特务，对我当面提出指控并作证。一个从来就不认识我的人，他却无中生有捏造了不少谎言，例如说我曾负责“文化总同盟”的什么工作等等。我被捕时用的名字是竹铭，不曾料到这时竟被指认为金丁。我断然予以否认，因为这种作证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请律师在辩诉书上为我提出了不容置疑的有力反证。

然而敌人究竟是怎样探到我就是金丁的这条线索呢？

大约这以后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庭对我的起诉书。

我为上海《春光》杂志写的一个短篇《烟》，这时还不曾修改完，因染患痢疾我病倒了。经几位难友建议给监狱当局写了个报告，要求调到病号监。

和我在北平就已相熟的宋之的同志，这时就关在病号监，但我没能同他调到一起。

我住的一间牢房里，先后调进调出的共三人，最后来的是吴简之（吴仲超同志）。简之比我年长，严肃，沉着，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而且生活颇有规律；又喜欢整洁，所以在我们那五平方米左右的号子里，书籍、衣物、被褥等都安放得井然有序。但他却不善于唱歌，更不象隔壁的一位严老先生（据说在上海一家中学教化学），从一早起床，除掉吃饭时间，他可以一个上午一直在学唱《国际歌》。

晚饭后，有时感到无聊起来，我和老宋往往站到窗口，大唱京戏。我们特别欣赏《坐宫》里的几句唱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潜水龙，久困沙滩。”也许这多少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境吧！但有一天，六号牢房里却唱起了《囚徒歌》，而唱的歌词中却有所不熟悉。我还不晓得，大家称之为老徐的这位难友，他会唱全部三段的歌词，而且唱得那么动人。

老徐也比我年长，健谈，听说他是从陆军监狱解到三分监的，坐牢的时间比大家都久，斗争经验也丰富。但我知道他确实就是《囚徒歌》的作者，并且懂得音乐，却是大半年以后的事了。难友相处的时间久了，彼此也就更加了解，并且增强了相互的信任。

这时我还不完全清楚，迈进同志是在怎样的具体背景下，写了这支被多少同志唱过的《囚徒歌》。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由看守偷带进来的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家都在议论着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了人民政府，并与红军定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大局总是会变的。当我们唱道：“凭他怎么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死的虽然牺牲了，活的依旧是在战斗，……”“失败是成功之母，胜利终归我们所有，……”我们总是感到信心倍增。确实是啊：“总有一天的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我没想到在我不服江苏省高等法院判决而上诉最高法院期间，有幸参加了三分监政治犯对监狱当局的一场斗争。

起因是病号监的一个政治犯，在放风时受到看守和另一刑事犯的无理凶殴。我和几个难友都亲眼目睹。大家开始还只是向看守理论，但看守却吹起哨子，立刻停止放风，病监的政治犯都被驱赶到号子里。

全分监的政治犯都感到义愤难平，根据各个号子的共同意见，决定下午罢饭，要求惩办打人的看守。

这天直到晚间才看到看守长悄悄跑进来，窥察动静，待到大家发觉他来并纷纷大声喊叫报告时，他却溜了。

一夜过去，没有任何反响，大家计议，次日早上和中午继续罢饭。

被打的政治犯午前被管理科叫去问话，有的看守则在散布流言，说什么政治犯里有人煽动闹事，气氛比前一天紧张。

如果中午罢饭以后，仍无反响，那么斗争的下一步将采取什么办法？有人主张复食，有人认为罢饭也不是办法。不过最后还

是取得一致的意见，晚饭继续罢下去。

病号监的政治犯，当时一共十人，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事情发生在病号监，如果监狱当局仍无答复，则病号监的政治犯继续绝食，其余的难友，不妨复食。我们还决定，尽量利用家属亲友探监的机会，把三分监虐待政治犯的消息传播出去。

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律师，请他到苏州来看我，并附了一封写给上海《申报》的信，把三分监这次殴打政治犯的事实经过，完全写了，请他代转。信请管理科挂号寄出。凑巧第三天上午，病号监里有同志的家属来探监，于是罢饭的消息很快地透露出去。

第四天上午，看守拿着管理科的条子，说是典狱长传我问话。同志们特别提醒我，一定要说明这次看守之所以伙同刑事犯打人，是因为他们敲诈勒索未遂。病号监的刑事犯曾公开提出，每月每个号子交多少钱，就可全日“放风”。

我和病号监的同志都已躺了三天，在同典狱长的谈话中，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他们不能不听完我的控诉和揭发，不过对政治犯提的要求，他们没有具体答复，只劝我们复食。管理科长最后说，我要寄给律师的信，他们不能寄发；如果我认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可以调我到另一小院的单人牢房。这当然是一种分化，我反对。为何还说什么要经过调查才能把信寄出呢？

不过这天下午，我们放风的时间开始延长。放风过后，病号监的房门也未上锁。晚饭的量显然增加，菜汤上也飘浮几点油星。有的“外役”还问我们是否要买鸡蛋。打人的那个看守从一天晚上就没有再来值勤。于是我们决定从当晚起开始复食。

斗争告一段落，斗争的结果是胜利，大家都受到了鼓舞。

两星期后，有看守传出消息，新典狱长不久即将上任。是否

撤换旧典狱长与政治犯的这次罢饭绝食有关？我们未曾料到，新典狱长到职的次日，从清早起，就不准开门倒马桶。接着是大批看守蜂拥而入，由典狱长指挥，对每个号子（主要是政治犯住的牢房）挨个进行搜查。敌人已经开始进行野蛮的镇压了。

所有政治犯的号子都没有搜查到什么。

这天晚上，我照例凭窗望着远处的夜空，四周很暗，仿佛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我沉默了很久，但最后又终于习以为常地唱起了《囚徒歌》。

“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都从火线上俘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俘来，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这以后的第三天上午，我收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我的刑期比原判增加了一倍。中饭之后，看守通知我，当日解往第三监狱。我和仲超、迈进等同志一一握别。在人生斗争的长途上，我仿佛又多懂得了不少事，一下子像变得勇敢沉着了很多。

.....

如今，四十九年一转眼过去了。一天早晨，我有幸和迈进同志聚首叙旧，想起我们都能活到七十几岁，殊出意料。我俩从我正在写《在特种监狱》的长篇谈起，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囚徒歌》。迈进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在一九二九年时他不过二十二岁。在上海，根据关向应同志的指示，他被派到杭州去恢复共青团的组织工作，并且传达“六大”的决议。浙江是C.C.的老

巢，“四·一二”以后，党团组织都受到了破坏。他到杭州不久，为了联系工作，有一次到约定的地方取信，不幸被捕，关进了浙江的陆军监狱。

当时狱中的情况是，有钱的犯人可以吃白米饭，饮清水；没钱则喝脏水，吃黄饭、臭菜。

当时政治犯也显得很散漫。如何团结自己，教育自己，并且消除和普通犯的隔阂呢？这是迈进同志入狱后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经过串联，首先是党员组织起来了。在一次纪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时，利用造币厂放汽笛的机会，政治犯齐唱起《国际歌》，甚至普通犯也都跟着唱起来了，歌声使监狱当局震惊。

在狱中，对监狱当局的每次斗争，都非常具体，但又并非轻易就能发动，因此必须善于抓住时机。迈进同志在陆军监狱经历的第一次斗争，是向管理科索回“存折”。原来每个犯人入狱时，随身携带的现钱，须交管理科保管。亲属寄钱，也只在存折上登记，用钱时要写报告凭存折买东西。但当时陆军监狱把犯人的存款都用于做投机生意，侵犯了每个犯人的具体利益，因而政治犯一经提出索回存折，连普通犯也响应，结果是管理科不得不让步。群众因此认识到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要斗争就必须跟政治犯一起行动。政治犯是最团结的。政治犯唱歌，普通犯也纷纷跟着唱歌，而唱歌又可以促使大家团结得更紧密。最后是在全监犯人签字提出十大要求得到胜利的背景下，带着饱满的政治热情，迈进同志写下了这一曲多少革命者唱过的《囚徒歌》：

“努力呀，锻炼；

勇敢呀，奋斗！
总有一天的红旗，
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现在距离《囚徒歌》的诞生，已五十三年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